

中国奇迹 :回顾与展望

林毅夫 姚瑶 洋瑶 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摇中国奇迹 :回顾与展望 轱毅夫 姚洋主编 援—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 摇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次印刷

摇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摇 I 援中...摇 II 援①林... ②姚...摇 III 援经济体制改革 原中国 原文集
IV 援五五五五五

摇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远)第 圆园园远号

摇书 名 :中国奇迹 :回顾与展望

著作责任者 :林毅夫摇姚洋摇姚洋摇主编

责 任 编 辑 :梁鸿飞摇刘云艳

标 准 书 号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出 版 发 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摇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圆缘号摇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

网 摇 址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电 子 信 箱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陈岸苑

电 摇 话 :邮购部 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摇发行部 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摇编辑部 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

排 版 者 :北京高新特打字服务社摇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

印 刷 者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远园毫米 伊远园毫米摇远开本摇圆缘号印张摇圆园千字

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版摇圆园园远年 源月第 员次印刷

印 摇 数 :圆园园远—圆园园远册

定 摇 价 :圆园园远元

摇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摇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前摇言

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里 ,中国的经济保持了 忽豫的平均年增长率。世界上从来没有另一个国家曾经在如此之长的时间内保持了如此之快的经济增长 ,中国的经济增长因此堪称奇迹。这个奇迹是如何实现的 ? 它能否持续 ? 本书收集的十五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解答。这些文章的作者均为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在 国源年 元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为庆祝成立十周年而举办的“中国经济展望”国际研讨会上这些论文获得了与会者的高度评价。全书分上、下两篇 ,上篇的四篇文章回顾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和中国经济转型的经验 ,下篇的十一篇文章则从金融体系、对外关系、农业和人口等方面对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展望。

上篇的四篇文章分别由哈佛大学经济系德怀特·帕金斯(阅管城孕澳译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亚太经济和管理学院郃若素(砸穿领那燎城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林毅夫教授以及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樊纲教授和香港大学经济及商业策略研究所陈瑜博士撰写 ,他们从不同的角度考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源泉、中国经济转型的动因和式样以及中国经济转型成功的经验。

帕金斯教授的文章《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考察了中国在整个 国世纪的经济增长过程 ,并将之与国际经验相对照。他的结论是 ,中国政策开放之后的高速经济增长并没有突破国际经验所显现的常规增长模式。过去十多年关于经济增长的跨国研究表明 ,有利的地理位置、稳定的政局、较高的教育水平、较高的贸易开放度和较高质量

的官僚体系对经济增长具有关键性的作用,而中国在所有这些方面都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做得好。帕金斯对中国过去五十多年的经济增长速度进行了重新核算,并对之进行了分解。他的细致入微的工作为我们重新思考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新视角。

郜若素教授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源泉》是帕金斯教授文章的自然延续,回答了后者没有回答的问题,即中国经济改革为什么取得成功?既然增长经济学已经告诉了我们促成经济增长的政府政策,为什么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没有采纳这些政策?郜若素教授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任澳大利亚驻中国大使,亲眼目睹了中国改革开放初始阶段的巨变。和帕金斯教授一样,他认为中国经济的成功得益于对外开放,但他进一步认为,对外开放并不必然成为中国的选择。中国之所以选择了对外开放,是因为邓小平为代表的务实的领导层在 1970 年代末成为中国政治舞台的主导力量,而这一转变不仅恰逢其时,赶上了国际市场较为宽松的时期,而且也恰逢其地,因为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的高速发展为中国树立了榜样。郜若素教授进一步认为,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改革之所以能够坚持下来,和中国领导层的务实图变的态度关系极大。改革没有蓝图,这不是坏事,因为这样改革就不会被经验的框框所束缚。

林毅夫教授的文章《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全面地探讨了中国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经验,并将之与苏东的转型进行了比较。传统的苏联模式的经济体系是具有内部一致性的制度安排,赶超战略导致了扭曲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傀儡一般的微观管理单位。通过这套体制,一个资本稀缺的经济才可能动员资源建立起资本密集的重工业。但这是一个低效的经济。中国经济的转型始于赋予微观单位部分自主权,由此打破了传统体制的整体性。一旦传统体制的整体性被打破,制度变迁就将以自我推进的方式进行,传统的体制将被更有效率的市场体制取代。在此过程中,由于自主权的增加以及非国有部门的竞争,国有企业的效率会有所提高。但是,经济的活力主要来自于新的、小型的、非国有企业的大量进入。原来的计划配置机制和扭曲的宏观政策环境逐渐失去了支持,最终被废弃。转型过程中,国家、企业和民

众有足够的时间适应新的市场体系。因为经济在整个转型过程中保持了强劲的增长,大多数人是能够在改革中获益的。采用“休克疗法”的东欧和前苏联国家也试图用更有效率的市场体系替代效率低下的计划体系。但是,大中型国有企业的私有化过程则相对滞后而且进展缓慢,因而这些国家的企业构成与转型中的中国经济的企业构成是类似的,然而中国的方法并没有中断国有部门的生产行为,因此,中国的渐进方法取得了“休克疗法”没有达到的效果,却避免了相应的成本。

樊纲教授和陈瑜博士的文章《“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以“过渡性杂种”为分析框架，探讨了乡镇企业从兴起到消亡的过程及其决定因素。他们试图通过对乡镇企业发展历程的分析，解答下面的一些问题：一种制度的改革是如何开始的，又是如何依赖于或受制于其他制度的？在经济决策过程中，制度（包括思想意识）及制度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影响（内生或外生的）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如何把“最优”和“均衡”这些概念和现实经济转型联系起来？一种“次优”状态能否通过内生的推动力转化为“最优”状态？这些问题到目前为止尚未被经济学家充分研究，对象乡镇企业这样的“新生物种”的关注会为制度经济学增添新的研究内容，并且有助于将制度经济学纳入现代经济学的一般理论框架之中。

下篇中的十一篇文章对决定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四个关键性领域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这四个领域是金融体系、对外关系、农业以及人口。金融体系是少数还未进行深入改革的领域之一,由于大量坏账的存在、高度的集中性以及监管制度的薄弱,金融体系是中国经济链条中最薄弱的一环。在对外关系方面,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兴起改变了东亚和世界制造业的格局,中国巨大的贸易和资本双顺差既对国内经济运行产生了压力,同时也增加了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的摩擦,人民币汇率制度的选择和资本账户的开放成为国际关注的热点问题。农业是中国经济中最落后的部门,却承载了中国近一半的人口,如何加快农业的工业化,是中国在 21 世纪必须解决的问题。与此同时,中国不得不面对人口迅速老龄化的问题。纵观世界各国的发展历程,每个国家高速发展的阶段一定

是人口增长率较高、人口结构较为年轻的阶段,人口红利是经济高速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相形之下,中国过早地进入了老龄社会,这将大大约束中国未来的增长潜力。下篇中的十一篇文章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以上四个领域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

下篇中有五篇文章讨论了金融体系问题。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平新乔教授和他的三位学生范瑛(耶鲁大学博士生)、郝朝艳、毛亮(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生)的文章《中国银行业的管制和竞争》对中国银行业的管制和竞争状况进行了总结和描述。他们认为,中国银行业仍然是一个由国有商业银行垄断的行业,竞争虽然已经开始,但由于政府在银行业的准入和监管方面设置的种种限制,外资银行与国内非国有的民营银行的业务扩展还是比较缓慢的。无论是在银行资本、信贷市场,还是在中间业务上,国有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仍然占据绝对的垄断地位。另一方面,尽管在银行业上政府是严加控制的,但并不是在所有方面政府的监管都很严。在个人信贷,尤其是在个人住宅抵押贷款与汽车信贷上,中国在 1995 年之前的管制都是偏松的。政府管制加上国有商业银行的垄断,导致了银行资本效率偏低、不良贷款比率高、资本充足率低等在风险管理与效率方面的问题。不仅如此,长期的国有商业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相对封闭的银企关系,使中国的银行业务内容与经营模式缺乏创新,银行中间业务与消费信贷至今发展缓慢,服务水平也有待提高。在加入 WTO 后面对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所带来的挑战,中国银行业在管制与竞争方面需要进一步改革。

林毅夫教授和法国图卢兹大学的李志赞博士的文章《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探讨了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体系改革之间的关系。他们认为,中国金融体系重建、发展和改革的每一步都与其他经济部门的改革紧密相关,而中国金融体系诸多问题的根源,也与实体经济部门改革问题的根源有一定的关联。市场化改革使国有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由隐性变为显性,政府需要对这些由于政策性负担造成的国有企业亏损负责。为了控制整个社会的金融资源,政府就必然要对金融体系进行垄断,这就导致了中国金融业的市場集中度很高,银行贷款大多都

贷给了国有企业,而股票市场的上市公司也大多是国企;此外,为了利用金融资源去补贴国有企业,政府就必须人为地压低金融产品的价格,这包括银行利率以及股票市场的市盈率,这也就使得中国金融产品市场化定价的改革难以彻底。

香港证监会主席沈联涛博士的文章《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来自东亚的经验教训》回顾了东亚金融发展的经验,并讨论了这些经验对中国内地的借鉴意义。他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察视角,从人口结构的角度来观察东亚金融结构的演变。他认为,如果一个国家比较年轻,那么它可能更关心增长率而不是资产和收入的保值。但是,随着亚洲人口开始进入中年,金融系统更应该对老年人的需求做出反应。亚洲的银行系统开始为消费者的需求融资,比如住房抵押贷款和消费信贷,日本、韩国、新加坡和香港地区更注重建立满足老年人需求的保险基金、养老基金和退休基金等金融产品。

中欧国际商学院、明尼苏达大学卡尔森管理学院张春教授的文章《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进一步讨论了发展阶段和最优金融结构之间的关系,并探讨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金融改革的意义。他首先讨论了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和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优势和劣势。在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中,投资者在获取投资信息和对公司的管理方面都存在搭便车现象,而且市场具有高流动性,从而不会鼓励投资者对绩效差的公司进行管理和采取行动,造成投资者目光短浅。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优势是分散的投资者具备信息优势,可以鉴别出项目的优劣,而且他们面临高度的预算约束,从而可以避免道德风险。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的优势是大银行有动力去收集信息并更有动力去参与管理,从而可以克服搭便车问题,劣势是银行受到政府的管制和保护,会采取更具冒险性的贷款,从而产生道德风险问题;并且,银行不能处理分散投资所需要的信息,从而不能做出正确的投资判断。一个国家究竟采用哪种金融结构,与这个国家的发展阶段有关。在经济发展早期,银行放贷的对象是一些赢利状况比较清晰的企业,因此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是合理的,但随着经济变得日益复杂化,银行在处理信息方面的劣势变得显著起来,市场主导型

金融结构就更适合一个国家的发展。张春认为,中国过去采用银行主导型金融结构是正确的,但目前已经到了发展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的时候。他对如何建立一个完备的市场主导型金融结构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方星海博士的文章《证券市场改革、稳定和一个方案》提出了稳步发展中国证券市场的一个方案。他的出发点是“中国金融改革的‘增长折现法’”,就是“把今后的增长折现成今天的价值,用以弥补过去产生的损失,弥补后推出改革,改革后再规范地发展”。按照此法则,结合当前实际情况,方星海提出了证券市场改革、稳定和一个方案,即适当借助证券市场外的资源,用以弥补证券市场本身的价值缺损,从而迅速稳妥解决股权分置和市场化发行这两大难题,为证券市场长期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下篇接下来的三篇文章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影响、资本账户开放顺序和汇率问题。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黄朝翰(黄朝翰)教授的文章《中国经济强劲增长对东亚的影响》讨论了中国经济增长对东亚经济一体化的影响。一方面,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东亚经济的火车头,东亚经济围绕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了重组,东亚开始向中国大量出口原材料和中间产品;另一方面,中国的高增长和高出口也对欠发达的东盟国家投下了巨大的阴影,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及向第三国市场出口制成品上,这些国家遭遇到了中国的正面竞争。为化解东盟对中国日益增长的担忧,中国政府迈出了大胆的一步,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协定,随后,“东盟+中国、日本、韩国”机制建立,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走向成熟。

日本大阪大学经济学教授高木信二和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施建淮副教授的文章《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战略》探讨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前提条件和开放顺序。他们认为,中国资本账户开放必须满足四个前提条件,即稳健的财政、健康和富有竞争力的银行部门、利率市场化和灵活的汇率制度,而中国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这四个条件,因此需要时间进行渐进式的推进。高木信二和施建淮进一步提出了中国资本账户开放的时间表,划分了四个阶段。第一阶段(圆年):取消对外直

是,它的迅速发展已经导致效率和公平两方面的改善,土地开始向专业农户集中,而且那些土地较少的农户也从土地市场获得了更多的土地。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保罗·舒尔茨(~~马宾~~ ~~马宾~~)的文章《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中国的意义》回顾了亚洲国家人口结构和储蓄的关系,探讨了人口红利存在的可能性。莫迪里安尼的生命周期储蓄假说预测储蓄将随着一个国家人口的年龄老化而下降,经济增长也会随之下滑。但是,这个理论忽略了经济和社会制度对于变化世界的适应能力,忽略了家庭重新分配资源、协调生命周期行为以及通过合理安排生活来提高家庭成员福利的能力。舒尔茨回顾了对亚洲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研究,发现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储蓄的长期上升是由于 ~~15~~ 岁至 ~~15~~ 岁人口比例的上升造成的。他的这个结论的一个含义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并不必然导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的下降。

和舒尔茨教授比较乐观的态度相比,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曾毅教授在其文章《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中则对中国人口老龄化表达了一定程度的担忧。他首先对中国人口老龄化的主要特征进行了概要的阐述与讨论,然后专门讨论了农村人口老龄化问题。中国农村人口老龄化程度显著高于城镇,而农村社会养老保障尚未建立,大多数地区几乎是零,养儿防老实际需求导致出生性别比与女婴死亡率大幅超常偏高。针对这些问题,曾毅探讨了建立农村储备积累式养老保障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最后,他讨论了充分利用今后十五年左右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少儿抚养比大幅下降,而老年人口比例与老年抚养比仍然较低而形成的“人口红利”机遇,大力发挥我国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方面的比较优势,在努力建立个人账户与社会统筹结合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的同时,继续发扬中华民族尊老爱老与家庭养老的优良传统,为应对 ~~15~~ 年之后人口老龄化高峰期到来的严峻挑战早做准备。

回顾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所走过的路,我们发现,中国所选择的制度变革路径和发展战略基本是正确的。本书上篇四篇文章的作者虽然对一些细节问题存在分歧,但他们都一致同意,中国之所以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并最终获得成功,和中国领导人的务实精神

以及对待问题的谦虚态度是分不开的。务实和谦虚引导中国采取了一种渐进和分散的改革和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

展望未来,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挑战和机遇并存。和高速的经济增长以及其他领域的剧变相比,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严重滞后,并有可能成为阻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导火索。但是,危机也意味着机会。中国过去四分之一世纪的高速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体制变革所释放的能量,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金融体系的改革和完善将为中国经济增长注入新的活力。本书所收集的五篇讨论金融体系的文章从不同的侧面为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提供了有益和新颖的建议,这些建议对于中国金融体系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自 20 世纪 80 年代末以来,亚洲和世界制造业格局围绕着中国这个“世界工厂”进行了重组,中国成为一个制成品中心,而亚太国家和地区成为中国原料和中间品的出口地。这个重组既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也给中国带来了新的挑战。

本书能够顺利出版,首先得益于福特基金会对研讨会的财政支持。我们在此深表感谢。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梁鸿飞先生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艰辛的劳动,没有他的工作,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林君秀女士也为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我们在此一并感谢。最后,我们要感谢所有文章作者和研讨会的参与者,他们是本书的主角。

林毅夫 姚姚洋
2003 年 8 月 10 日

目 录

前言	林毅夫 姚 洋 / 1
----	-------------

上篇 回 顾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德怀特·帕金斯 / 3
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源泉	郜若素 / 31
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经验	林毅夫 / 37
“过渡性杂种”：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及制度转型	樊 纲 陈 瑜 / 77

下篇 展 望

中国银行业的管制和竞争	平新乔 郝朝艳 毛 亮 范 瑛 / 101
中国的国有企业与金融体制改革	林毅夫 李志赞 / 123
经济增长的最优金融结构：来自东亚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沈联涛 / 154
中国金融体系的发展	张 春 / 169
证券市场改革、稳定和发展的一个方案	方星海 / 177

中国经济增长对东亚的影响	黄朝翰 / 190
中国资本账户自由化的战略	高木信二 施建淮 / 212
汇率制度与经济增长：来自亚洲发展中国家和欧洲发达国家的 经验研究	黄海洲 普里扬卡·马尔霍塔 / 241
中国的农村经济与通向现代工业国之路	罗思高 黄季焜 / 266
人口结构和储蓄：亚洲的经验证据及其对 中国的意义	保罗·舒尔茨 / 298
中国人口老化、退休金缺口与农村养老保障	曾 毅 / 334

上摇篇

回摇摇顾

从历史和国际的视角看中国的经济增长

德怀特·帕金斯

(哈佛大学)

中国自 1978 年以后 30 年的高速增长和结构变化 , 并非是凭空出现的。在 1978 年以前 , 中国为工业化和现代经济增长付出了一个世纪的努力。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 , 很多努力都由于战争和政治动荡而失败了 , 从而没有带来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 , 但是 , 这些努力却为中国现代经济搭建了基石。在 1949 年到 1978 年之间 , 中国只是非常有限地利用了已有的基础。但是像其他很多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发展中经济体一样 , 中国也沉浸在拒绝依靠市场力量的苏联模式中 , 只关心封闭经济和高投资率 , 进而导致了对生产资料的过分强调。那时 , 很多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模式有可能带来最快的增长 , 不仅仅是费尔德曼-马哈拉诺比斯 (云里雾里) 模型中的投资者 , 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如纳克斯 (砸锅卖铁) 和缪尔达尔 (砸锅卖铁) 也是这样认为 , 他们坚信 , 通过高投入来动员发展中国家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是有助处的。

近期的增长理论不支持 20 世纪 70 年代以前苏联和中国采取的封闭经济模式 , 认为中国同其他发展中国家相比 , 既有优势 , 又有不足。正如我们将要在下文中看到的 , 在许多经济学家的跨国回归分析中 , 中国的“国别效应”是显著的。所以 , 从国际间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 1978 年以来的高速增长 , 有利于我们理解其背后的原因。

要了解 1949 年以后中国取得了哪些成就,关键是理解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同 1949 年代到 1979 年代相比,中国为增长所采取的措施有何不同。这里的很多内容是众所周知的。本文不会详述过去 1949 年中发生的许多关键性的政治变革,而是要重点考察这些政治变革如何转化为更高的增长速度和更快的结构变化。例如,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所发生的一切与高速资本积累有关,还是与政策和制度变革所导致的全要素生产率的高速增长有关?过去的 1949 年当中,不同的部门是否都从这些改革中受益?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速,是否是城市越来越繁荣,而其他地区的人口却远远落在了后面?

一、对 1949 年以前的中国经济的简单回顾

中国建立现代工业的努力可以回溯到 19 世纪 80 年代,如果算上“中国轮船招商局”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的话,这一时间将会更早。除了少数的高级官员(如李鸿章和张之洞),中国政府中很少有人理解为什么需要建立一个现代经济,而那些少数找到正确发展方向的人,却苦于没有财政资源来支持他们。^① 即便如此,中国在这个时期还是建立了第一家现代纺织厂以及若干其他类型的现代工厂。在 1949 年,在外国武力威胁下,中国开始对外国投资开放。

从 19 世纪 80 年代到 20 世纪 30 年代前期,现代工业以一个相当快的速度增长。由于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施加的不平等条约,对工业采取保护性关税是不可能的,但是现代纺织业仍然成长起来。中国一直是一个棉纺织品的主要进口国,先是从欧洲,然后是从日本,但是到了 20 世纪 30 年代,得益于中国和日本商人在上海及其他地方开设的工厂,中国已经可以自行生产大部分棉纺织品。在 20 世纪初,由于日本人开始在东北扩大其影响,该地区的铁路、采矿业和重工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① 正如王业键指出的,清政府可用的税收收入仅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10%,其中大部分都用于支持朝廷的运作和军队的开销(资料来源,第 10 页)。

日本人在 1932 年成立伪满洲国后,这些产业的发展更加迅速。

从 19 世纪后半叶到 20 世纪 20 年代,国际贸易和国际商业机构也得到了较大发展。在 20 世纪初,国际商务、外国市场行情以及国际联络大部分都掌握在外国人手中,但是为这些外国公司供应茶叶和丝绸的国内商业始终掌握在中国商人手中。数十年之后,外国商人的角色逐渐淡出,中国商人开始占领中国对外贸易的各个领域。

20 世纪 20 年代的现代工业增长速度达到年均 15% 左右,在当时而言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增长的基数实在是太小了。^① 对 1913—1927 年和 1927—1937 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最保守的估计表明,当时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速度为年均 10% 左右到 12%,使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每年大约增长 1%。^② 然而到了 1937 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加即使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都损失掉了。

上述的增长对于 1937 年以后的增长有作用吗?1937 年到 1945 年间的长期战乱毁坏了大量的厂房和基础设施,尽管后来苏联的援助又为东北提供了一些替代资源,但是苏联军队毕竟从中国东北带走了大量日本的生产设备。然而,从欧洲和日本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验中我们得知,实物资本是没有人力资本和制度重要的。但是中国在 1937 年以后同样失去了一些与管理现代经济相关的人力资源。很多上海的公司都迁往香港甚至纽约,其他的都移到了台湾;在东北的日本管理人员和工程师也在几年后离开了。但是中国并没有损失现代经济所需的全部人力资源,也没有损失大量现代基础设施和工业厂房。大多数的工人和领班都留了下来,许多经理人员也留下了,但他们在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中没有受到重用。

中国在 20 世纪 30 年代能够相当迅速地增长,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遗留下来的资源。官方的观点是,直到 1949 年中国经济才全

^① 罗斯基(《动荡的年代》,第 100 页)。这个数字是 1913 年到 1927 年间用增加值加权计算的制造业部门的增长率。

^② 罗斯基(《动荡的年代》,第 100 页)。这些数据是罗斯基认为最可靠的估计值,他估计的完整区间是在 1913 年到 1927 年之间。